

義

律（西元一八七四—一九六〇）

徐宗林

一、早年



的氣象，尤其是在美國二十世紀開始的那段日子裏。

義律可以說是許多卓越的美國教育行政人員的一種典型。他的才華展露在教育制度之確定，教育實際問題的解決，以及把教育看成為推動人民福祉的信仰與精神上。義律並不是一位諄諄教誨的教學工作者；他也不是一位追隨世俗眾人意見的教育行政人員。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雖然能對受教者的

思想，態度，行為，為人處世的種種，提供指示的方針，但總不及把教育看成是一種事業，當作是個人理想實現的一種途徑，來得有意義。義律就是一位謀求實現教育理想的教育行政人員。

義律的父親是英國的移民，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育。在英國時，從師學藝，練習做鐵匠。一八七〇年來到美國，常在美國中西部及東部一帶謀生。八年以後，移居愛荷華州(Iowa)，時值美國西部鐵路建築的黃金時期，遂定居在愛荷華州的Cedar Rapids鎮。一八八一年，遷至那不拉斯加(Nebraska)州的North Platte，任職於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Union Pacific)，初任鐵匠，後來升任工頭。就在這樣一個家庭背景下，義律先後擔任過中學教師，督學，教育局長，大學校長，尤其難得的是他在美國中西部的普渡大學，先後擔任了二十餘年的校長。貧賤的家庭，艱苦的童年，半工半讀的大學生活，在在證明了環境並沒有限制住他；相反的，惡劣的境遇，倒是激勵了他，成為使他出人頭地的一股力量。成功不是偶然的，因為他有許多特殊的人格特質，才使得他走向成功，邁向坦途。

義律出生於支加哥(Chicago)，時值一八七四年，大部份的童年生活，都消磨在North Platte。幼年時，義律是一位非常好動的兒童，幹家務事，玩球，溜冰，作印地安人打仗的遊戲，這些都帶有美國邊疆墾荒的味道；不過，雖然兒童時，遊戲佔去了不少的時間，但是，義律非常熱衷於知識的追求，酷愛閱讀，凡是能夠找到的書，他都把它讀完，他自認在他上大學時，他的英文，要比他的兒女完成高中教育時為好。

一八九〇年，義律讀完了三年制的高中，後來，因為當地教育董事會通過高中延長為四年，他又

返[回]North Platte的高中，多讀了一年，次年，才正式畢業。就在一八九一年的秋天，義律到了那不拉斯加大學繼續深造。在他讀高中時，由於對化學老師非常欽佩，大學一年的課程，就偏重在化學。故在四年後，他獲得了理學士的學位。

為了維持大學的費用，義律曾在[他父親的朋友漢第（Charles Hendy）開設的農場工作；工作單調而辛苦，在夏天要把牛群冬天吃的草割好，頭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但是，工資卻微薄的很；不過，義律在後來，還是懷念著那段苦日子。

大學的第四年，義律加入了當時大學本部的軍官訓練團（The Cadet Corps），因而，認識了波辛（John J. Pershing）軍訓教官。他跟波辛的友誼，維持了很久；在波辛歡渡其七十誕辰時，義律和他曾在華盛頓再度相遇。波辛對他的影響，乃是嚴格的體操訓練，爾後義律在餐桌上，如果看見他的子女坐的姿勢不對，總是訓誡地說：「坐直，肩膀縮回去，否則我拿一個柱子，來撐起你們的腰」。

在義律從那不拉斯加大學畢業的時候，很想在高中擔任教學的工作，而他所熟稔的老師，也在協助他，向各學校推薦，但是，希望都落了空，他只好在大學繼續讀下去，以助教的名義，獲得了獎學金，而於一八九七年，獲得理學碩士的學位。這時，他還是喜歡在中學擔任教職，四處託人，在他知道了歐梅哈（Omaha）的中學，有一個空位時，他趕緊申請，初步的答覆是令他滿意的，然而，就在他準備去的時候，一位剛從德國獲得博士學位的Dr. Senter，捷足先登，義律的夢，又給打破了。直至這一年的秋天，他才受聘去了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利德維爾（Leadville）中學任教，算是

實現了他初期對教育工作的心願。

利德維爾中學是礦業城鎮的唯一中學，義律為了工作，個人的名望，孜孜矻矻地工作著，一切理科教學的簡易設備，都出自他的手。一八九八年的五月，作為當地教育董事會一員的勞蘭（Nowland）的女兒，宴請義律參加盛會。那天下午義律正在自己設計的暗房裏，陪一位學生作實驗，宴會的時間快到了，義律才匆匆赴會，留下學生一人繼續作實驗。第二天一早，他才知道自己設計而裝設的暗房，已在無情的火焰下，燒得一乾二淨。內心餘悸猶存，靜待免職的通知，誰知這場風波，卻在無聲無息的不安中過去了。事後，他覺得那一個星期，實在過得太慢。不久，當地教育董事會宣佈聘他當學校督學時，他簡直不敢相信。當時年薪一五〇〇元，他欣然接受聘請，展開了他教育行政的生涯，而且就在燒毀他自己設計的暗房那一天的宴會上，他才認識的勞蘭小姐，後來竟成為他的妻子。

任職利德維爾中學督學期間，他極力提高學校設備的水準，特別是幾百個學童飲水的事；水瓢僅有幾隻，水桶有限，他大聲疾呼，學童的衛生應該加以注意，雖然，那個時候「衛生」（Sanitation）這個字眼，許多人都茫然無知。他建議提高教師待遇，不能再以年薪一〇〇〇元作為教師的最高薪，因為那遠不及一位礦工的收入。他排好了會見教師的時間，期求溝通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的意見。他鼓勵教師閱讀當時盛行的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心理學，希望教師們應用心理學於教學上。他並且發出信件，呼籲家長儘量約制子女外出參加一些不必要的聚會，因而沒有時間去預習功課。

義律在利德維爾工作了六年，的確想到自己需要再進一步的研究，一八九八年，哥倫比亞大學師

範學院成立，次年，該院教授羅素（James E. Russell）曾邀義律前來從事研究工作。一九〇一年杜威（John Dewey）在支加哥大學成立了教育系後，也曾物色義律前往，無奈都因經濟的問題，使他沒有成行。直到一九〇三年，他才又經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邀請，至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並得機會至德國耶拿（Jena）大學留學，加強語文能力。在哥倫比亞大學這段時間裏，義律受業於心理學家桑戴克（Thorndike），研究在教育上如何利用科學的方法，去瞭解教育事實，制訂教育上的各項設施問題。義律是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首先將統計方法，應用在學校行政上的理論家之一。在他得到了博士學位後，出任威斯康辛（Wisconsin）州立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

威斯康辛大學的教育系，是新成立的一個系。威斯康辛州的教育制度，教育系負有培養全州師資的任務，所以，大學與州公共教育局之間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但是，當時的大學校長和州教育局長之間，往往相互爭執，互不相讓，在這種局面下，義律擔任了威斯康辛大學中學教師委任委員會的職務。他以靈活的行政幹才，周旋於大學校長與州教育局局長之間，委實不是容易的事。

義律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期間，對教育的貢獻計有：

(A) 當時從事一般學校行政及教育行政的人員，對於教育的現象，莫不採取個人主觀的態度，加以臆測，遽然給予論斷，故有人就不認為大學的成績和中學的成績會有任何的關聯性。義律則和Dearborn合作，以測驗的方法，來證明不能苟同的見解，而且肯定地說明了教育現象，有賴於科學方法的試探與證驗。

(B) 一九一二年前後，威斯康辛州的教育主管，是一名叫卡銳（Cary）的人負責；因為：他是全中小學教育的行政長官，但對於當時教育專業人員公認的著名中學學生所受的教育，並不完全瞭解。從他主觀的見地，一個州自治的政治型態下，教育行政是在平等的原則下來發展的，怎麼會有參差的現象存在呢？義律就和當時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教育系的講師Starch合作，先以英文的同樣作業二份，分送給一四二位（分成二組）英文老師加以評分，結果是各位教師的評分，在等第上，評分制度上都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所評的分數，新教師，分數較高；偏僻地區的教師，分數也較高；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分數平均為低，而且，城市裏的教師，在分數上評得也較低。事實的發現，否定了當時威斯康辛州高中畢業生成績具有可靠性的說法。

(C) 教師訓練的推進，早在義律擔任利德維爾城的督學時，他就甚為注意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學的教育系，負責全州教師的訓練計劃，義律首先努力於觀念的溝通，故請邁德生市（Madison）（即威斯康辛大學所在地）中學與威大合作，設立實驗性的附屬中學，作為中小學教學觀摩的場所，由威大的教育系遴選五位教師，擔任教學，作為示範教學的中心學校；其次；義律在教師證書與教師資格上，積極提高要求，以期齊一教師的水準。

(D) 一九一〇年，義律經由研究而制訂出一種測量教師良窳的評鑑量表，稱之為Provisional Plan for the Measure of Merit of Teachers，藉由學生或其他人員，對教師的教學工作或人格作一評量演變至今日，一些美國大學學生自治團體，往往在學期結束前，拿出一些類似的測驗或問卷，來衡量一個

教師的種種教學活動。

(E) 改革鄉村教育，也是當時義律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以外的興趣之一。他曾建議把教育行政的單位擴大，將地方教育組織，予以調整並加強；提議擔任督學者，應不具備黨派的彩色；確立新教師的典範，並且呼籲重新組織課程；又大聲疾呼，應聘請教育專家，來擔任教育局長或督學。

(F) 美國在一九一一年以後，全國掀起了學校調查的浪潮，由於美國教育行政，為地方政府的一項主要行政措施，往往冀求從調查中發現問題，瞭解現狀，以擬訂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實施之方針；教育之科學化，既然是當時一股思想界的主流，故於教育上應用統計、測驗、問卷等方法，就表現在一九一一年後的教育界。例如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紐約市學校調查；一九一三年的波特蘭市（Portland）的學校調查；同年維蒙州（Vermont）的學校調查；均有義律的參與及貢獻，難怪渥爾泰·愛爾斯（Walter C. Eells）在其「美國高等教育調查」（Survey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937）中讚譽義律對學校調查之貢獻時說：「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考查與具有試驗般引起人們激怒型的調查之不同，主要是由義律在一九一四年倡導的。」

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州立大學是處在發展的新時代中，州立大學都在致力於擴充與發展，而推動這股發展的力量，是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的教育哲學。義律對發展州立大學的實際工作，雖在出任了蒙他拿州（Montana）大學總校長之後，但是，他對美國州立大學基於民主教育哲學見地的發展方向，卻在他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時就形成了。他以為一般偏重在文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學院 (College)，多半是私立的，學習的重心，偏重在傳統性的科目上，與實際生活，個人的職業需求或關係，不太密切；他期望州立大學，在運用全州人民的經費下，發展成為屬於全體人民的高等教育機構，以期實現民主的政治制度。故他認為：「現在州立大學，最顯著的問題，就是發現一些方式或方法，以服務於一般人民，而促進其日常生活之改善。」

一 蒙他拿大學校長

一九一六年，義律的生涯，轉換成為負責一州的高等教育的行政人員；他在同事與師長反對多於贊成的情況下，經過長時期的週詳考慮後，接受了蒙他拿 (Montana) 大學總校長的職務，因而離開了威斯康辛大學，去收拾四分五裂的蒙他拿大學。

蒙他拿是鄰近加拿大而靠美國西北部的一州，以農業及礦產——銅為主。當時隸屬於蒙他拿大學名義下的一共有四個州立學院：一個學院是以農業為主，設立在Bozeman；以礦業為主的，設立在Butte；培養中小學教師的師範學院，設立在Dillon；而蒙他拿州立大學 (The State University) 則設立在Missoula。四個學院都有著自己的校長，但是，卻沒有一位總校長 (Chancellor) 來綜理、協調四所高等教育機構。由於地方派系，本位主義的作祟，四所學校，各顯身手，以爭取經費，擴張各個學院，行政上四所大學毫無關聯，經費上也是各自為政，利益上相互衝突；大學總校長，處於夾縫中，很難有所作為。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下，難怪有許多的親朋好友，要勸阻義律去赴任了。

為了要樹立起他的行政典範，義律首先提出了十項條件，作為他就任蒙他拿大學總校長的前提。

這十項條件的要點為：全體教育董事會人員及四所學院校長及院長必須一致投票贊同聘任他；任期至少三年；年俸起薪為八千（是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的二倍）；他的任期始自一九一六年的二月一日。在蒙他拿州求賢若渴的情況下，蒙州教育董事會，都一一欣然接受，義律也就走馬上任了。

在他與蒙州教育當局的相互了解下，義律表示在他任職的前六個月，他不想發任何公開性的演說，涉及到他的行政方針，他先從了解現況，深入問題著手，專心一意於大學教育行政事務之處理，避免無謂的批評與干擾。

接任蒙他拿大學總校長之後，他首先就制定了預算制度，確立同一形式的會計制度；歸併並裁減重疊的課程，其至連四所學校為了招收學生所張貼的海報，義律都規定須在同一張海報上，列出四校的招生事項，不許各校單獨刊印及張貼；另外，他把分屬於四校的校友會，聯合成為蒙他拿大學校友會，並出版校友通訊，處處以蒙他拿大學為標題，而不再以各學院的名義出面，這樣，一個統一的蒙他拿大學，漸漸就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

其次，在義律服務於蒙他拿州立大學的這段不算短的日子裡——六年——他又致力於大學經費的張羅。他發起勸募運動，希望各個社會階層，踴躍捐獻。另外，他又著手整理蒙他拿大學有關的大學法令，希望能有一整套的法令，來確定大學之目的，大學總校長之職責，大學之體制，教員任用等規定。雖然，在他任期裏，沒有完成，就轉任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不過，他已奠定了三個

起點，功績也不能算小。

就在他任職於蒙他拿大學的日子裏，他漸漸地形成了他個人對大學的一種想法，也可以說是他對美國州立大學的一種期望，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及個人的態度。他說：

「作為蒙他拿大學總校長，我並不認為我的工作，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除非蒙他拿州的人民，不分階級或職業，都認識到他們的州立大學是一個值得的教育機構，即是在想法上，能夠提供給他們獲到幸福的需要，以及他們生活的滿足與理想；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堅定地建立起使教育成為可能的那些原則，以期教育工作真正成為可能為止。」

上面的這段話，成了義律個人終身努力奮鬥的目標，成為他以後繼續在高等教育行政方面致力的一個旨趣，也就是他的普渡哲學（Purdue Philosophy）的核心所在。

一九二二年，他在蒙他拿州教育界一片惋惜與懷念的心情下，離開了蒙州，轉任普渡大學的第六任校長。在他任職蒙大五十年後的一九六六年，該校建立了一批宿舍，取名為「義律村」（Elliott Village），來紀念他對蒙他拿州立大學的貢獻。

三 普渡大學校長

一九二二年的五月十六日，義律在普渡大學董事會歡迎的茶會上，講了一句意義深長的話。他說：「普渡使我感覺到榮耀，我將致力於使普渡大學獲得榮耀。」

普渡大學是美國中西部、印地安那州的一所高等教育機構，以農業教育和工科教育出名。當時除了普渡大學以外，該州尚有在 Bloomington 的印地安那大學及一所師範學校 (Normal Schools)。

普渡大學的情況，並不像他接任蒙他拿大學總校長時那樣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也沒有像蒙他拿州教育行政受著地方派系的影響；當時的普渡大學與學校董事會之間及州教育局之間，都能和睦相處，實在是一個平靜而可有所作為的局面。

普渡的校長斯頓 (Winthrop F. Stone)，在一次爬山的意外事件中去世，學校董事會先請馬歇爾 (Marshall) 以副校長的名義，暫時代理，以便從容物色理想的校長。董事會的人員，曾經分別在印地安那州鄰近的各州物色人選，也到美國東部各個大學請求推薦人選，最後，董事會決定聘請義律出任。義律首先提出了十項條件，大體上為董事會接受，只有薪俸一項，董事會決定以蒙他拿州的同等薪俸為標準；另外提供宿舍……在雙方諒解的情形下，義律就在九月，就任了普渡大學的校長職務。

義律就任普渡大學校長之後不久，人們對他的印象是親切，精幹，擅於口才，對學生，教師，有時人格或人情 (Humanity) 的考慮多於規則 (Regulation) 的要求，是一位熱衷於推動大學體育活動的領導者；因為，就在他就任校長的第二月（一九二二年的十月）一次校際足球比賽會上，他捲起了袖子，脫去了上衣，跟學生一起吶喊著加油，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志同道合的運動迷。

「了解情況」是他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一項箴言。他認為當時普渡大學的教育，應該集中注意來處理下列有關的教育問題。在學生方面，為學生住宿、社交生活、廣泛的體育活動、以及提供發展學

生個別差異的各種方法等；在教授方面，為教授研究與教學上應求更好的協調、減少任教人員擔任學校行政工作等；在行政方面，為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教室及設備，尤其要使教學在如何更能有系統有控制的方式下來進行。其次，如何使大學校友們，對母校的發展有所貢獻。另外，在他與學校董事會人員之間，確立了一項原則，即大學董事會，負責大學一般財政原則性問題之決定；有關大學教育政策之決定，是隸屬於大學校長職權範圍之內的，他人不得干涉。

一九二八年前，義律就開始分別訪問普渡大學的畢業校友，該年的五月，他作了二十四天的校友訪問，每到一處，就發表演說，強調校友與大學今後之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每次校友會的刊物，他都儘量發表言論，來溝通校友對普渡大學的觀念，難怪普大校友會，曾先後買了二部轎車贈送給他，其中的一部，就是在他退休以後，他都珍藏起來，作為紀念。校友會與大學之間的結合，也是美國大學教育的特色之一，而校友對大學之發展，真是出錢出力；尤其，後來一位普大校友當選上了印地安那州的州長，在普渡大學發展上，特別是經費的分配上，更有所協助。

義律擔任普渡大學校長的前六年，其薪俸都是年薪一二〇〇〇元。一九二八年四月的一次大學董事會上，在義律離席外出不久，返回會場時，董事會的董事長羅士（Dave Ross）就宣佈義律校長的新俸，經過董事會的同意，決定提高到年俸一五〇〇〇元，並且宣佈在下個會計年度就正式生效。在一致的恭賀聲後，義律委婉地拒絕了加薪，因為，他認為當時普渡大學的財政情況，並不太理想；事隔一年，他才接受了董事會的加薪決定。

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二年，是義律擔任普渡大學第一個十年；他把普渡大學的發展，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普渡大學與本州及其他工業界領袖之合作；由大學提供工業界各項問題之研究解決途徑；增設研究院；確定頒授名譽學位，增加體育學位；採取教授對學生社會及道德方面所提出的報告；設立普渡基金等，都是在他的理想州立大學的哲學下，一一付諸實現了。在他回憶這十年的任期與工作時，有幾句話真是肺腑之言，他說：

「從任何一方面來說，我最好的十年，並不就是普渡大學最好的十年。十年當中，我充滿了新鮮事業的嘗試——有幻想的，也有實際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有豐腴的，也有不足的；有辛苦的，也有快慰的；有滿意的，也有失望的；各種嘗試，有鉤心鬥角的，也有真誠合作的。」

四 晚 年

在義律擔任普渡大學校長二十三年的漫長歲月中，他面臨到的困難真是不一而足。特別是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國經濟大恐慌，及一九四〇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他愈加了解到普渡大學財政問題的嚴重性。這兩個階段的難關，都在義律堅定的態度和縝密的行政措施下，一一渡過。戰後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迅速的膨脹下，帶來了更多的問題，有待更年輕的大學校長去解決。服務了二十三年的義律校長，雖已年近古稀，但他充沛的精力，依然對普渡大學有所貢獻。不過，大學董事會恪遵法令的規定，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一次教授特別聚會上，宣佈了義律退休的聲明。

義律自普渡大學退休以後，在一九四五年夏曾擔任全美藥物調查工作，並出版調查報告；不過大部份的時間是消磨於私人生活。義律從普渡大學退休時，董事會為了尊敬他的卓越貢獻，曾經決定頒贈他為普渡大學名譽校長，並專撥一間辦公室供他利用；除了退休金之外，每年給予七千五百元的終身俸。

一九六〇年的六月十六日，這位獻身於美國高等教育行政的專業人員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五。義律的教育理想，是民治教育的成長與公眾教育理想的實現。他尤其重視到州立大學對促進當地社區發展上所能發揮的功效。大學教育之實行，在義律心目中，特別珍視的乃是「平等」原則，以及大學與社會結合的原則。

當一九四〇年，普渡大學蓋好了第一座音樂廳，義律曾經頒佈祝賀之辭。他說：

「這一座音樂廳，在以後的悠悠歲月裏，將有無數的男男女女，以及兒童，來這裏看、聽、思考，因而能夠超越自己、提升自己，漸漸地，一步一步地，經由他們聽、看以及思考，來教育自己。」

大學的教育設施也就是社會施教的場所。學校是推進社會、國家、文化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鎮，而不應高高地躲進象牙之塔。同時，一位教育家並非完全侷限於諄諄教誨的教學活動；而製訂教育計劃，建立教育制度，將教育看成為謀求社會進步與樹人的事業，其對教育之貢獻並不比一般誨人不倦的教育家有何遜色；這也許就是西方文化中，另一種教育家的典範。